

中式经济模式及其对科技创新的启示

周 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中国经济有一套特有的经济运行模式,这套模式对于中国经济不同主体的科技创新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将首先证明中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参与者如国有企业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参与市场,在此间有不同的政府机构来协调这些企业的活动;同时,大部分的中国民营企业以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参与经济。我们认为这个框架可能会解释不同类型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我们的预测是,协调型市场经济的企业往往有渐进式的创新,以补充它们现有的技术,而自由市场经济的企业往往有激进式的创新,产生与现有的存量有很大不同的技术。

关键词: 资本主义多样性; 科技创新; 中国经济模式; 技术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 F4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14)01-045-10

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已经讨论了许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制度架构,使得架构内的多种制度相辅相成。互补性的制度架构可以构成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使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不仅来自比较优势理论所认为的自然禀赋,还来自其相辅相成的制度架构。^①一方面,在如德国这样的经济体,我们看到的互补性制度的例子包括银行和制造商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企业和工会合作发起的技能培训项目,有利于劳资双方集体协议的法制环境,等。^②另一方面,在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互补性制度的例子包括金融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强调通用技能训练的教育体系,以及敌视集体协商的政治气氛。不同的制度互补性使一些国家在某些经济活动中能比别的国家做得更好。^③

由于在过去三十年间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最近几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这么长的时间”,^④在转变过程中数亿人口的生活被改变了。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制度基础,我们将可以以更高的精度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本文应用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并拿中国模式与两种主流的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相比较。认为在中国践行的这套独特的经济模式已经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的技术创新

收稿日期:2013-10-12

作者简介:周 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

①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

② Miriam Golden. “The dynamics of trade unionism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437—454.

③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a.

④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在中国,协调型的市场经济主体其创新往往是渐进式的,增加了它们现有的存量技术,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主体往往有激进式的创新,产生了不同于现有存量的技术。原因就在于互补性的制度在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导致不同的企业根据其关系与地位的情况选择最佳的创新路径。

一、中式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是,在中国,经济活动的组织遵循两种并行的规则体系。这一部分旨在通过描述中国经济在几个关键领域的表现来树立这一论点。

1. 资本

对于世界上任何的现代经济体而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如何获得必要的资本(资金)。一个国家获得资本的方式可能从根本上决定它的发展道路,而它“何时”进入发展的轨道则可能决定其资本积累的方式。例如,亚力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提出,一个国家的落后状态深刻地决定了这个国家获得资本的方式,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径。^⑤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作为一个没有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英国有时间通过企业家们自己的积蓄慢慢地积累资本,在此过程中银行和国家只发挥了微弱的促进作用。德国可没有英国这样的奢侈。作为一个在英国之后工业化的国家,德国承受着必须比英国及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更快工业化的压力,否则它将在 19 世纪后期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形势决定了德国的工业化不仅需要企业家们本身的储蓄,还需要其他的财务支持。所以德国的实业家们与大银行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网使得主要制造企业的董事会通常包括了来自银行和企业双方的代表,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将在与银行进行深入的咨询后做出,而银行会承诺提供优惠利率的长期贷款。^⑥

当苏联开始自己的工业化的时候,国际舞台上已经挤满了列强,如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美国和新兴的日本。格申克龙认为,这样的背景是苏联选择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的根本原因,这造就了斯大林式的强制集体化,计划经济,对重工业的极度重视。在资本投资方面,对许多重工业项目而言,即使是德国式的企业和银行的联盟也不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必要的数额巨大的投资。所以苏联为了筹集足够的资本而使用了暴力,具体就是通过强制集体化和细致的规划,以及劳动力的大规模动员。^⑦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策略是奏效的,苏联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

但是这些历史对于当代中国有何借鉴意义?毕竟,在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里,中国主要是在模仿苏联,但在经济上却有灾难性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自 1978 以来,中国的发展其主要动力是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资本配置的过程中中国摒弃了强大政府的作用。

⑤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⑥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⑦ John Padget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conomic Reform: Soviet Union and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2. 与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⑧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Zhou Li.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ointers for othe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310), 1994.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2nd ed. Shanghai: Truth and Wisdom Press, 2009.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业主导的。^⑨例如,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总量的近80%是来自银行的贷款。中国的银行系统是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⑩在2005年,四大银行加在一起占中国总银行资产的50%。^⑪

不同于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当中追求利润是银行的唯一动机,作为国有企业,中国的四大银行必须调和它们获取利润的动机与它们服务国家任务的使命。1993年之前,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中央政府实现“没有输家的改革”的战略,这就意味着为了让许多效率低下的企业维持下去而继续提供贷款,即使这些贷款可能变成不良资产。90年代末期不良资产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于是1998年后中国政府用了极大的气力来处理不良资产问题,包括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容纳从四大行转移出的不良资产,注入数十亿美元到四大行以改善它们的资产负债表。^⑫然而,只要中国政府仍以引领中国走向工业化为己任,不良贷款问题是不太可能从根源上解决的。因为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地用诸如五年计划等形式来设定优先发展的经济领域;无论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何,政府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这些优先项目得到足够的资金。作为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银行系统将被充分利用起来以服务这些政治目标。

四大银行主导的中国银行业会优先把资金配置给其他的国有企业,但私人公司的项目却绝无可能得到相同的关注度以及相应的资金配置。这样的设置驱使私营公司去争夺有限的、尚未被分配到国有企业的资金。例如,在2009年,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内总共贷出了超过14.6万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其中约7000亿元贷给了私营企业和个人,相比之下,农业部门得到了约2.2万亿元的贷款。^⑬考虑到私人非农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通常要比一个典型的农业项目相对更高,很明显,中国的信贷分配并不是完全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尽管从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那里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然完成了巨大的投资。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2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企业8.3万亿,而民营企业占6万亿以上,个体工商户贡献了约1万亿;^⑭其他重要的投资主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7万亿),股份有限公司(1.7万亿)与集体(1万亿),等。私营企业通常不是依靠正规的银行系统获取资金,而是仰仗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如从家庭成员和朋友处的借款,利用留存的利润,找私人信贷机构和地下钱庄,等。^{⑮⑯}从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贡献而言,据经合组织估计,私营部门占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9.2%。^⑰艾伦等人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在2004年主要由民营企业

⑨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⑩ 以总资产量作降序排序,四大行是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与中国银行(BOC)。

⑪ John Padget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conomic Reform: Soviet Union and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2. 与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⑫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⑬ 中国统计年鉴[DB/OL]. 2011.

⑭ 中国统计年鉴[DB/OL]. 2011.

⑮ 这样非正规甚至非法的操作有时可能会演变为大面积的金融问题,如2012年在温州出现的一次金融恐慌。

⑯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⑰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05.

组成的混合部门的总产出,超过了国有与上市部门的总产出之和。^⑮

除银行体系外,中国企业也从其他类型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了部分投资资金。然而,在资本配置上这些其他类型的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同时政府也对它们控制严密。例如,到2004年,中国股市的总价值约为GDP的23%,这与墨西哥这个股票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差不多。而且,如果只计算流通股的股票市值^⑯,中国股市的总价值下降到GDP的7%左右,在发展中大国里是最低的。^⑰此外,在股票市场上市的许可是由政府严格控制的,自然,受到政府青睐的企业将更有可能在股票市场上市。^⑱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甚至落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债券市场主要发行政府债券或政策债券。截至2003年,政府债券的总额相当于GDP的19%,未偿的政策债券占GDP的10%。^⑲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职责是支持政府中意的企业,这些企业基本无须忧虑市场竞争和破产风险。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支持“没有输家的改革”的策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大堆不良资产。自1998以来,随着改革战略的转移,资本市场的作用变成了保证给优先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自始至终,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私人部门服务。私人部门被要求自谋生路,它们只能在正规资本市场的边缘获得服务。资本配置的二元论在中国清楚地体现出来。

2. 技能培养

工人们在工作中需要工作技能,公司需要员工有合适的技能来完成订单。然而,在不同的发达工业国,工人获得技能的途径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训练工人的方式不同于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如德国。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工人往往具有一般技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换工作,因此更能够互换。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培训机构加强了这种技能形成的模式,企业通过对标准化和自动化生产过程的投资来适应这样的技能形成模式,从而更好地应对劳动力供给的波动。^⑳另一方面,协调型市场经济体通过诸如学徒制和专业技术学校等各种长效机制,从工人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培训员工。工人们由于有长期稳定就业的承诺而有动机接受专门的训练,公司因为劳动力的高质量以及员工离职风险的降低而有激励投资在这些工人身上。这些致力于培养专门技能的精心设计的培训计划促进了工人和企业之间的默契,而协调型市场经济内部强大且涵盖甚广的劳工及雇主组织则进一步担保了这些默契的实现。^㉑

⑮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⑯ 中国股市有流通和非流通两种股票,政府机构控制大部分的非流通股。

⑰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⑱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⑲ Franklin Alle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⑳ Pepper Culpepper. Employ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ed Cooperation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8.

㉑ Pepper Culpepper. Employ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ed Cooperation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8. 与 Geoffrey Garrett.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像大多数其他经济体一样,在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蓝领和白领这两种类型的工人,其主要区别为体力劳动是否是工作的主要内容。由于白领的工作知识含量较高,中国的白领们最有可能是来自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了在艺术和科学科目中,以及他们所选择的领域里专业课程的系统训练。然而,在中国,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合作还处于萌芽阶段,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一般不知道他/她会在毕业后去哪家公司。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的结合通常在学生受教育期快要结束时才发生,而不是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学生的自然倾向是成为通才而不是专家,以尽量减少在学校期间的专业训练在离开学校后可能过时或无用的风险。这一点很像美国式的教育系统:在学校期间的训练在各个公司间都适用;而不像德国式的强调专业培训的教育系统。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员工离职率已经相当之高,这支持了中国新毕业生劳动力的技能往往是通用型而非专业型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够在毕业后的前几年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②5}

在这个谱系的另一端是蓝领工人。中国蓝领工人的很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都有小学教育(这一点可以由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推出),很大部分有初中或高中水平的教育。他们所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和所上学校的类型表明,他们不太可能接受到具体公司的培训,所以他们的初始技能也往往是通用型的。有一些报告表明,一些企业开始在劳动力的来源地设立培训中心,也有报道说,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已经为了更好地帮助当地的工人适应他们未来的工作而建立了职业培训中心。^{②6}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外来农民工的大多数在开始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时没有企业层面的特殊技能,他们将依赖于由雇主提供的现场培训;然而,农民工在企业或行业间的高流动性抑制了雇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的动机。^{②7}

据估计,2002年中国城镇1.4亿工人中大约一半是技术工人。在这些技术工人中,60%具有入门级的技能,35%具有中级技能,只有5%的人具有高水平技能。与此相比,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是,具有高技能的技术工人占35%,中级人员占50%,而初级工人只占15%。^{②8}此外,中国的高技能工人往往年纪偏大,接近退休,且工资偏低。近年来中国高技能工人的短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2008年,每100个高技能的蓝领工人就有102个工作机会;在IT界,60万个工作岗位有42万个无法招到工人。^{②9}

中国的技术工人主要在各种技术学校里接受训练,这些学校的大多数人是中学毕业后决定不去上大学的学生。技术学校不仅为制造业,而且为其他领域如医疗保健,儿童教育,以及各种服务业培养学生。从1999年开始的中国大学的扩招吸引走了相当一部分潜在的技术学校的学员,并把他们变成了大学毕业生,^{③0}这可能加剧了技术工人在中国的短缺。况且,技术学校的培训质量一直被人们公开诟病。这是一个三元悖论:公司对于它们将要雇用的学生没有多大信心,学校认为主要是进来的学生教育底子太差,而学生则认为他们实际操作工业设备的机会太少了。^{③1}

国有企业可能还有一些历史遗产可以依靠,如从计划经济时代传承下来的高技能工人,等。

②5 前程无忧。“2012 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EB/OL]. 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11. 11

②6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再就业培训有关问题解答”. 2012-9-18. <http://www.hefei.gov.cn/n1070/n305971/n21683541/n21684706/n21733856/n21734323/n21735299/25520849.html>.

②7 李翔:“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长效机制”,《继续教育研究》,2009,12:49-51.

②8 秦杰、邹声文、沈陆涛:“中国制造谁来造?”,《新华社》,2002-3-10. <http://finance.sina.com.cn/jygl/20020310/178593.html>.

②9 王翠荣:“在制度层面消除技工荒”,《中国质量报》,2008-11-14.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si/239599.html>.

③0 温源:“中国如何破解技工荒”,《光明日报》,2011-3-1.

③1 西祠胡同:“中国技工荒的原因”,2010.6.29. <http://www.xici.net/d123374049.htm>.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像任何其他在中国的公司一样,开始担心如何招募到足够数量的高度熟练的工人。

私营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获得熟练的技术工人。例如它们可以通过用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挖走国有企业的工人。或者它们可以建立与技术培训学校的关系,要求学校定向培养具有特定技能的学生。在此过程中,这些私营企业开始提供就业保障或类似的承诺来吸引学生接受这样的训练。这可能是具有协调型市场经济风格的学校与企业合作的雏形。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定向培训是否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技能培训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除与学校合作外,民营企业还可以用对工人进行现场培训等方式升级现有的劳动力以得到熟练的技术工人。

还有一种对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中国企业都越来越重要的获得训练有素的蓝领和白领工人的方式,就是聘请那些在海外工作或学习过的中国人回中国工作。如谢德华所称,这是一种“制度外包”,^②用人单位把培训具有特殊技能工人的任务外包给中国以外的机构。这样,雇主避免了在中国没有类似培训机构的不足,而仍能雇佣到拥有合适技能的工人。这种制度外包的另一个形式是,许多中国企业直接聘请具有高技能的外国人。例如,日本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联系了不少在日本失业的高技能的日本工人到中国公司来工作。^③

总之,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技能的形成方面,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匹配的通用型技能占主导,但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二元结构的痕迹。国有企业仍然享受着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大批高技能工人,而且由于它们能提供有保障的就业,使它们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内或国外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民营企业则没有从拥有大批高技能工人的人才库中挑选雇员的奢侈机会,他们只能从劳动力市场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才。半熟练的工人如农民工往往遵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配置方式,劳动通常是标准化的,而且工人们可以相互替代。

3. 企业间关系

在不同经济体内部,公司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在自由市场模式的经济体,同行业的公司间在市场上激烈的竞争是一个常见的场景,新创立的企业来得快去得也快。在蓬勃发展中的行业如电信业,竞争和公司的更新比在其他成熟的行业要更明显。股票市场上的恶意收购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其目的是为了迅速摒弃羸弱的企业,同时给强大的企业留出空间。

在协调型市场经济体,有关的或类似的公司通常聚集在一个或几个财团(或网络)当中。在每一个财团,不同的公司负责生产链条中的不同环节,如零部件生产,组装,零售,保险等。日本的企业集团是突出的例子。日本企业集团有水平和垂直两种类型,水平的企业集团如三井、住友、三菱等;它们分别由数十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一个大型银行,若干制造企业,一套供销体系,以及其他的部分。垂直企业集团如丰田和松下由一个制造业的母公司和一整套大型的由分包商和供应商组成的长期服务网络构成。^④德国的企业也往往是紧密地集成在共生网络之中的。德国主要的企业都与银行有着广泛的联系,如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在超过15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的董事会中都有席位。银行与公司洽谈投资的资金成本、商品的价格、供应安排和经济规划。此外,德国各大企业与主要是由中小企业组成的机械制造业联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中小企业群是德国重要的出口商,也是如化学品和机床等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与美国不同的是,在德国的股

② 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Economic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王翠荣:“在制度层面消除技工荒”,《中国质量报》,2008-11-14.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si/239599.html>. 与 晓午:“中国技工荒的思考”. 搜狐教育. 2003-11-7. <http://learning.sohu.com/48/11/article215321148.shtml>.

④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票市场上,对公司的恶意收购不仅不容易,事实上也是被禁止的。^⑤

而谈到中国企业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幅复杂的图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数目不多但体量庞大。^⑥中央企业受到中央政府的密切监测和管理。在央企所在的行业里,它们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它们之间不会直接竞争。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各自行业内的跨国公司巨头。因为这些中央企业是如此之大,几乎所有的本企业主要业务运行所需要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各自的国有企业当中。例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可以处理太空计划的整个过程,包括设计,制造,装配,发射,监测和回收航天器(包括运载火箭、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进行深空探测,以及建设防御系统。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为一个任务所需的大部分必要的协调将在公司内部等级制框架内发生,而这将极大地减少交易与信息交流的成本。^⑦从企业间的协调而言,仍以中国航天器为例,在制造,发射和回收的过程中,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必不可少,如那些专门从事材料,能源,运输等的企业,甚至包括军方。如此类活动所涉及的企业间复杂的关系将很容易地超越单个企业的能力所能顾及的程度(无论它有多大),完成它们之间分工协调的重担最终会由国家承担。^⑧

在最高政治领导层之外,日常的企业间、行业间的关系往往是由两个强有力的中央机构来协调的,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前者负责实施长期的经济计划,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后者则主要是监管中央企业。^⑨省级与以下级别的国有企业由各级的发改委和国资委管理。

此外还有构成了中国经济大部分的非国有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形成复杂的网络或协会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未来会形成这些组织。大多数现有的民营企业的结社往往是基于地理区域或特定行业的。在中国罕有跨行业或跨区域的商业协会,这不同于在日本(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一个代表日本大企业的团体)和德国(如德国工业联合会)。^⑩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互相竞争,压低产品价格,迫使企业在非常薄的利润上运转。换句话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经营。

显而易见,就企业间的关系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有企业拥有复杂的协调机制来协调它们的行动;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这样的机制,竞争是它们市场活动的主要原则。这种差异必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4. 政企关系

国家如何处理其与国内企业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介入企业的事务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只是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起到一个裁判的作用。政企关系在工业政策的制定这个方面表现得尤其清楚。譬如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的传统认识是,并不存在一个关于美国工业应该由什么来构成的顶层设计,美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竞争塑成的。虽然对于这种自由放任式的美国产业政策存在着一些强烈的反对,但一般而

^⑤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⑥ 截至2012年共有117家央企。见国资委央企名录2012。

^⑦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 与 Oliver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⑧ 例如在2012年和2013年载人航天神舟9号和10号的过程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在飞船任务的不同阶段亮相发射场及飞控中心,显示了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协调。

^⑨ Yookyung Yeo. "Contextualiz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ase of China's central state enterprise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22(81): 460—475.

^⑩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言可以认为美国经济没有一个连贯的产业政策。

在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内,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政企关系在这里要比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更紧密。政府不仅是企业之间交易的裁判,它们也积极地指导某些交易的进行。如德国的地方政府往往是其辖区内的主要制造企业的大股东,它们会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特别是涉及重大投资的决策。在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现在称为经济、贸易和工业部(METI))曾经主导了有关于企业的经济政策,如企业信贷和出口配额的分配,指导投资方向,劝阻潜在的竞争者进入某些行业等。通产省的官员经常在退休后到私营企业利润丰厚的位置任职,而他们在任时曾经帮过这些企业。^④ 不难想象,这样的关系将会影响当前官员的决策,因为他们现在的所为将影响到他们退休后的生活。不用说,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勾结是经常发生的。

对一些中国公司来说,政企关系可以说是“非常近”的。政府可能会同时既拥有企业又做企业的裁判员。这种情况适用于国有企业;国家一方面拥有这些公司,另一方面又制定管理国有企业的(通常是有利的)法规。我们已经在以前的部分里阐述了国有企业如何能够通过把自身定位在一个协调型的社会网络中而获得相对其他企业比如在获得投资方面的优势。然而,中国政府和某些类型企业的特殊关系不仅限于大型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通常由地方政府拥有和管理,因此,可以预期地方性法规会有利于这些乡镇企业。地方政府和当地的商业利益往往是彼此衔接的;乡镇企业可以为当地经济贡献GDP,就业和税收,以及为地方政府提供其他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的好处;当地政府官员为了提升自己在官僚系统里的晋升机会,竞相表现自己能提供更好的地方经济绩效,促进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可谓是一石两鸟。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小圈子之外的民营企业很少能得到如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一般的优待,它们可能只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环境来与这些公司彼此竞争。

二、对中式经济模式的一些思考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是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模式来组织其经济,并认识到一些模式所涉及的机构与制度。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有两套经济并存,每套都以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行事。中国的两套经济其分别的经济模式大致与当代发达工业国施行的“协调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对应。在其中一套,中国有一个高度协调的经济。中国政府取代了通常处于主要的网络中心位置的银行,来发挥在各经济实体之间协调的作用。通常是由公共部门控制的经济实体倾向于遵循这种方式的协调。它们的资金来源,与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关系,它们的市场份额和劳资关系,都是由政府引导的。这些企业已经与政权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它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源于这种关系。在这一个政府协调型的经济里,所有的参与者的最重要的资产是它们与政府根深蒂固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体系内的所有主体都将努力保持和加强这种关系。

另一套中国经济由众多中小型民营经济实体组成,它们生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它们往往绝缘于正规的资本市场,没有国家的直接指导,互相激烈的竞争,以及非常灵活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它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而是如何敏捷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已经涌现出一些新兴的产业集群,如在浙江和广东境内的一些专营日用消费品的产业集群,且集群中开始有一些自发的生产协调。^⑤ 然而,一个有效的跨行业跨区域

^④ 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Pingfan Qian. "Our Industrial Clots: Thei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3, 12: 26-31. 与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的生产者网络尚未在中国经济中出现。在许多方面,中国民营企业践行市场经济的方式,与当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它们尚无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时代里的践行方式很类似。

到目前为止,并存于中国的两种模式的市场经济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且失业率较低。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是否可以凭借这样的制度设置成长为发达的工业国。我们已经看到,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无论是自由市场模式或协调型市场模式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治的能实现高人均收入的发展模式。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两个模式(或两个模式的变种)相互交织,这个混合的模式是否仍然具有能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内部一致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会反映在技术上。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由于任何一种要素在进一步被投入生产过程中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收益的边际递减,当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唯一的能在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即持续改进技术。^④ 无数经济体失败的历史教训可以支持这个论点,例如,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的方面可以归咎于其总体经济的低效率。^⑤ 因此,探讨中国的混合二元经济模式对于中国本土技术创新有何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三、对科技创新的启示

经济活动以何种方式来组织会对本经济体内部的技术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投资。然而,作为代价,资本市场要求短期内就收到回报,通常以季度或年度为目标。这种短期导向驱使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企业或其他实体把它们创新努力的目标对准了那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有最大成功机会的项目。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帮助企业去追求快速的技术突破,因为关于任何创新项目所需人才的招聘和解聘都可以快速完成。而人才从一个公司或行业流动到另一个的过程也可能会同时转让技术诀窍。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私人企业快速创新,这对企业的生存是生死攸关的。至于存量技术,工会的阻力,或现有治理结构,都不会在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被过分关注。所以在自由市场经济体,技术创新往往是由私人出资的,创新的主体是私营的企业,它们自己承担风险并收获创新的收益。它们的技术创新通常代表了激进式的突破。与此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常是高度发达的,因为创新主体需要合法化且有保障地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垄断来保证自己的风险投资可以获得盈利。^⑥

协调型市场经济的互补性制度支持了对技术创新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协调型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不如自由市场经济体发达,因为企业的投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其在各自的网络中与财团的关系得到满足。恶意收购是不受欢迎的,投资的预期回报期比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长得多。这种设置使协调型市场经济的企业能面向长期成功的前景而从事创新。协调型市场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助于企业技术战略的施行。工人们大多具有企业或特定行业的技能,这让他们可以浸淫于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针对具体产品的高技能不仅能保持高水平的产品质量,而且使

^④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62—78. 与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⑤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62—78. 与 John Padget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conomic Reform: Soviet Union and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2.

^⑥ 与此同时,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也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例如在军事领域,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用政府资金资助了许多前瞻式的项目,它们当时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日后市场化了的互联网。对于这类政府资助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请见傅军: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Proposition of Two Marke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3.

这个特定产品任何进一步的改善更容易地实现。^④ 企业因此更愿意对现有产品或一些相关的产品进行改进,而不太可能从事一些有可能会颠覆现有的运行良好的生产过程的根本性技术变革。协调型市场经济体的政府通常会支持企业渐进式的技术策略,因为这样对包括商业利益和劳工组织在内的群体影响最小。专利的数据印证了这样的专业化模式,如德国倾向专精于工程行业、各种机械工具、运输工具、但美国往往长于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与德国恰恰相反。

在给定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协调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两种模式下企业从事创新的方式不同,那么我们既然能观察到中国经济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混合二元格局,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活动的不同主体会从事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呢?本文的后续研究将试图以实证的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China's Economic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ZHOU Qiang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economic model now being practiced in China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terns among major players in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is unique because it features a dualistic economic structure, where economic players such a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markets in a highly coordinated fashion, with sev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coordinat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private domestic firms operate in a way that fits the economic models of liberal market. This framework is employed to expla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tern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firms. It is expected that firms from the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amp tend to have innovations that are incremental to their existing stock of technology, whereas firms from the liberal market economy camp tend to have innovations that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ir existing stock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variety of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ina's economic model

^④ Gary Herrigel, Volker Wittke and Ulrich Voskamp. Mutually Beneficial Upgrading: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Developed Country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J].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1.